

文心雕龍簡論

張文勛 杜東枝

文心雕龙简论

张文勋 杜东枝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封面设计：杨 阳

书名题字：刘炳森

文心雕龙简论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8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4 \frac{1}{4}$

198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8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3,000

书号 10019 · 3039 定价 0.38 元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文心雕龙》的写作及其历史地位	3
第一节 刘勰的生平和《文心雕龙》的写作	3
第二节 《文心雕龙》的时代背景	7
第三节 《文心雕龙》的基本内容及其在我国文学理论 发展史上的地位	13
第二章 《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	23
第一节 《文心雕龙》中的儒家思想	23
第二节 关于《文心雕龙》中儒家思想的评价	26
第三节 澄清几种观点	33
第三章 《文心雕龙》关于文学创作的一般理论	38
第一节 关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38
第二节 关于创作方法	44
第三节 关于艺术风格	50
第四章 《文心雕龙》论创作过程和表现手法	62
第一节 关于艺术构思	62
第二节 关于主题和题材	71
第三节 关于形象思维和比兴手法	76
第四节 关于语言文字的要求和音律对偶的运用	84
第五章 《文心雕龙》论文学批评	94

第一节	文学批评的方法	94
第二节	批评家的修养和态度	97
第三节	文学批评的标准	101
第六章	《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	107
第一节	文学的起源问题	107
第二节	文学发展与社会现实的关系	110
第三节	文学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	119
后 记		127

引 言

一千四百多年前，在我国南北朝的齐梁之际，出现了一部卓越的文学理论专著，这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这部文学理论专著，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文学产生以来一千多年的创作经验和文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提出了许多深刻的独创的见解，对后代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这样一部有重大价值的文学理论专著，建国以来，不少同志曾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它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在《文心雕龙》研究工作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四人帮”按照他们所鼓吹的“儒法斗争”的公式，给古人划线站队，把《文心雕龙》一棍子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在文艺理论研究和如何对待古代文化遗产的问题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因此，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开展对古代文化遗产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究，这是今后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重要任务。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要批判地继承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样才能发展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对《文心雕龙》这样一部卓越的古

代文学理论著作，毫无疑问应该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探讨，使它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写了这一本小册子，希望它对初学古典文学理论的读者能有所帮助。同时，我们又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文心雕龙》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广大的读者和专家们。

第一章 《文心雕龙》的写作 及其历史地位

《文心雕龙》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也是我国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内，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的产物。因此，要了解这部著作的产生及其历史地位，就必须对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时代背景，进行必要的分析和研究，把《文心雕龙》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

第一节 刘勰的生平和《文心雕龙》的写作

刘勰，字彦和，原籍东莞莒县（今山东莒县）。他的祖父一代随东晋王朝跑到南方以后，“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刘勰就是在这里出生和长大的。《南史》和《梁书》有他的本传，但都很简略，只可看到他的经历的一个大概轮廓；关于他的身世以及学术活动，都无更多的资料可供查考。就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知道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他的先祖是汉宗室贵族，祖父灵真是宋司空刘秀之的弟弟。司空是“三公”

之一，地位相当高^①。他的父亲名叫刘尚，官至越骑校尉，在刘勰还小的时候就死去了^②，此后家庭日趋没落。《刘勰传》中说，他“家贫不婚娶”。把“不婚娶”的原因，完全归结为“家贫”，这种说法也许有一些夸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地主阶级当中，刘勰的家庭是比较清贫的。他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就到定林寺去“依沙门僧祐”生活，也可能与家境有关。这种情况对刘勰思想的形成，无疑是有很大影响的。

刘勰的家庭虽然已经没落，但他毕竟是地主阶级贵族家庭的后裔，还不至一贫如洗，所以，从小就有机会受到很好的文化教养。后来，他到定林寺依僧祐寄居，一住就是十多年之久。当时，定林寺是有名的大佛寺，僧祐是有名的和尚。梁代释慧皎在《高僧传》中记载说，齐永明中，僧祐奉敕命入吴宣讲佛法，并用所获得的全部“信施”^③，把定林、建初等寺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扩建；同时还“造立经藏，搜校卷轴”，对佛教经籍进行了搜集整理，使得“寺庙广开，法言无坠”。在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僧祐还“使人抄撰要事，为《三藏记》《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及《宏明集》等，皆行于世”^④。对佛典的这样大规模搜集整理工作，当然不是僧祐一个人所能完成，而是许多人的集体合作才能胜任。刘勰追随僧祐寄居定林寺，看来也

① 司徒、司马、司空，称三公。刘秀之生前做过益州、郢州等地刺史，死后追赠司空。

② 《梁书·刘勰传》：“勰早孤”。

③ 信施：和尚利用宣讲佛经所获得的钱财。

④ 俱见《高僧传·释僧祐传》。

不单纯是为了生活问题，可能主要是去帮助僧祐从事佛经的整理研究工作。本传中说：“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这也说明刘勰是僧祐整理研究佛典的主要助手。由于刘勰自幼“笃志好学”，受了十多年的教育，又在定林寺埋头搞了十多年的研究工作，所以，他不但“博通经论”，而且还“长于佛理”。据说，当时的“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都要请刘勰撰文，可见他对佛典的研究是很精深的。可惜他这方面的作品多已散佚，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仅有《灭惑论》^①和《剡县石城寺弥勒石像碑铭》^②两篇。剡县在今浙江省嵊县附近，梁武帝曾命僧祐造过巨大的剡溪石像，刘勰为弥勒石像撰碑铭，也足证明他是撰文能手了。这一切都表明，刘勰之所以能写成《文心雕龙》这样一部内容丰富、析理缜密的文学理论巨著，是和他的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写作经验分不开的。

刘勰离开定林寺出仕时，已经近四十岁了。本传中说：“天监初，起家奉朝请”。天监是梁武帝的年号，是公元502年改用的。刘勰出仕，大约就是在公元503年前后。“奉朝请”是属于特邀列席之类的人员，没有实际的职务^③。后来才正式出任梁临川王的记室，历任车骑仓曹参军、太末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等职。通事舍人是“掌呈奏案章”^④的文职官员，实际地位并不高。直至天监十八年左右，刘勰奉梁

① 载《宏明集》。

② 载《艺文类聚》七十六。

③ 《宋书·百官志》：“奉朝请，无员，亦不为官……奉朝会请召而已。”

④ 见《宋书·百官志》。

武帝之命又一次到定林寺去参加“撰经”，编成《众经要抄》。事毕，请求出家，自燔鬓发，改名慧地，不到一年就死去了。关于刘勰的生卒年月，无法精确断定，据范文澜同志的考证，大约生于宋泰始初（公元466年左右），卒于梁普通二年（公元521年），寿约56岁^①，历宋、齐、梁三朝。

《文心雕龙》成书于什么时候，亦无明确记载；但根据本书提供的一些线索，可以大致断定是在南齐末期，即他在定林寺寄居的时候。何以见得呢？刘勰在《序志》篇中说他决定“搦笔和墨，乃始论文”是在“齿在逾立”的时候。刘勰生于宋泰始初年，到南齐末正是三十出头，年龄大致吻合。写这样一部长篇巨制，当然不会是急就章，至少也得两三年的时间，估计完稿是在齐和帝的时候。《序志》篇是最后一篇，未注明成书年月。但在《时序》篇中，有“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之语。刘勰在谈到各个朝代时，皆直称朝代之名，独于“齐”字上冠以“皇”字，无疑是对当朝的尊称。对齐太祖（肖道成）以下诸皇帝，文中也都加以吹捧，到齐明帝之后，又说“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这很明显是指南齐末的和帝^②，这说明《文心雕龙》的成书不会晚于齐末。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可佐证：刘勰写完《文心雕龙》之后，很看重自己的这部著作，可惜因为他的社会地位不高，名声不大，“未为时流所称”。他很想“取定于

① 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序志》篇注。最近，李庆甲同志在《刘勰卒年考》中认为刘勰卒于公元532年，寿约67岁（见《文学评论丛刊》第一辑，1978年出版）。

②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阅清代刘毓崧《书文心雕龙后》（见《通雅堂集》）。

沈约”，以期引起人们的重视。当时沈约正是“盛贵”的时候，刘勰想求见一面是很困难的，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自己背着书稿在门外等候，沈约出来时，就“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这果然引起了沈约的注意，“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①。沈约在齐和帝时，官至骠骑司马，入梁为吏部尚书兼右仆射，刘勰想求见面而“无由自达”，应该就是在这个时期，这也是《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末的一个佐证。弄清《文心雕龙》写作年代，对了解作者的思想是有帮助的。《文心雕龙》中不乏愤世嫉俗之词，对反动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深表不满，这和刘勰在未出仕之前的社会地位和境遇是分不开的。书成后不久，刘勰就“起家奉朝请”，接着就出来做官，这也许是和《文心雕龙》的问世及沈约的推重有一定的关系吧。

第二节 《文心雕龙》的时代背景

《文心雕龙》的产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状况和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是分不开的，和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以及文学领域中的斗争，更是有着直接的联系。

首先，让我们看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状况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在魏、蜀、吴三国鼎立数十年之后，司马氏建立了西晋王朝，中国得到短暂的统一。但是，司马氏政权的社会基础是很薄弱的，受到严重破坏的生产力，不可能很快恢复和发展

^① 《梁书·刘勰传》。

起来；而司马氏又大搞宗室分封，一些宗族王侯，豪门贵族，享有很多的特权，他们大肆兼并土地，扩大庄园，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逐步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再加上北方一些少数民族部落统治集团的不断骚乱，民族矛盾也日趋尖锐。在这种情况下，西晋王朝很快就垮台了，晋元帝（司马睿）和一批大地主官僚集团逃到南方，建立了偏安江左的东晋小王朝。从此以后，中国形成长期的南北分裂，直到隋朝统一中国，长达二百七十多年之久（公元317—589年）。其间，南方经历了东晋、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更替，北方经历了所谓“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和北魏、北齐、北周历朝的统治。在这漫长的岁月中，除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一主要矛盾之外，地主阶级内部、特别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大地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很复杂尖锐。他们为了争夺土地、争夺权力，不断地发动战争，互相残杀；不断地改朝换代，更替统治集团。至于南北两方统治集团之间所发动的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更为突出。这些无休止的战乱和残酷的剥削，使得广大人民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大地主官僚统治集团，则过着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生活。面对这严峻的现实，刘勰深感不满，也为本阶级的前途和命运深感不安。他写《文心雕龙》的目的，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大力宣传文学的社会政治作用，力图通过文学去改变现实，使社会回到所谓的“先王圣化”的轨道，建立他所追求的“君臣炳焕”、“军国昭明”那样一种理想的封建秩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时结合有关文学理论的阐述，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对历代腐朽的政治和黑暗的现

实，则给以激烈的批评和抨击。所谓“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史传》），正是他写《文心雕龙》的现实目的。

《文心雕龙》的产生，和当时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更是有着密切的关系。自魏晋以来，由于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的冲击，以及长期的社会动乱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那被定为“一尊”的儒术，也不那么灵光了。原来董仲舒定儒术为“一尊”，是为了实现天下的“大一统”，这时，天下已经无法“一统”了，儒术也难保“一尊”的地位了。儒家思想虽然还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主要统治思想，但是，老庄之学，般若之说^①，也风靡一时。魏晋时期喜谈玄学，是大家所熟知的。所谓“玄学”，实际上是“儒”与“道”的混合物。它的最早倡导者如王弼、何晏之徒，他们一方面尊崇儒家的“名教”，注释儒家经典，同时又鼓吹老庄学说。他们力图使儒道合流，把儒学的“义理”加以阐发，最后纳入道家的“虚无”的哲理之中。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因为这种思想不但使当时的豪门士族统治集团，可以找到暂时的精神安慰，以填补精神上的空虚，更主要的是可以麻醉人民群众，使人们脱离现实，放弃反抗和斗争，达到扑灭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的目的。于是，他们交口谈玄，拱手论道，侈谈虚无，标榜清高，甚至炼丹服药，希图保命长生。在玄学盛行的同时，佛教也日渐发展起来。东晋以后，特别是南北朝时期，无论是南方或北方的统治者，在不废儒学以装点门面的同时，大力提倡信佛，因为佛

① 般若：佛家语，义为智慧，是宣扬佛教教义的。

家消极出世的反动思想，在那长期动乱、民不聊生的时代，容易使人们幻想忘掉残酷的现实而去追求虚无飘渺的“西方极乐世界”，把幸福的希望寄托于来世。封建统治阶级正是希图利用它来麻醉人民群众，掩盖本阶级的反动实质，消弭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于是，他们右手拿刀，左手举起插着杨柳枝的净水瓶^①，卖力地念起“阿弥陀佛”来了。的确，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席卷全国，其势力之大，影响之深，在我国历史上可谓登峰造极。就帝王来说，东晋的明帝、哀帝、简文帝、孝武帝等都崇信佛教，宋、齐、梁、陈各代帝王，更为突出，梁武帝曾三次舍身入同泰寺做和尚，还正式宣布佛教为国教。至于皇亲国戚，王子公卿，信佛的就更多了，真所谓上有好之，下必有甚焉者，经皇帝这么一提徇，下边信佛之风就更厉害了。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相对而言是衰落了，但并未废弃。封建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强化思想统治，他们时而大兴儒学，时而谈玄论佛，事实上，他们是要把三者都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因此，就编造出所谓“三教同源”的理论，硬把老子、孔子说成是如来佛的弟子，虽然这是胡说八道，但是从儒、佛、道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这个意义上说，那的确可谓是“三教同源”了。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根据现实的需要，封建统治阶级在使用时有所侧重而已。鲁迅说得好：“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

① 这是佛家所鼓吹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的形象。

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鲁迅尖锐地讽刺道，他们口头上说“信教”，其实是“吃教”，“有宜于专吃的时代，则指归应定于一尊，有宜合吃的时代，则诸教亦本非异致，不过一碟是全鸭，一碟是杂拌儿而已”^①。话虽不多，却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吃教”的阶级实质。六朝时期，儒释道被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统治集团所交替使用或同时使用，成为束缚人民思想的精神枷锁，是强化地主阶级专政的思想武器。

上述情况，对刘勰不可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必然要反映到《文心雕龙》中来。如前所述，刘勰一生中，大半岁月从事整理佛典，钻研佛学，直至死前还出家当了和尚，说他是一个佛教徒，是符合实际的；但他同时又是儒家的信徒，是孔子的崇拜者，这也是事实；唯独对道家以及后世的“神仙小道”、“愚狡方士”则表示不满，提出过批评^②。看来，刘勰是力图沟通儒释而为其所用，所以他认为“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又说：“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汉语隔而化通。”^③在刘勰看来，要使动乱的社会现实得到改变，只有用佛理去“净化”人们的精神世界，用儒学去治国平天下。因此，他一边在宣传佛理，一边又在《文心雕龙》中高举儒家的旗帜，吸取其经世致用的精神，提倡用文学去改变人心世道；而对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的“玄风”，

① 《准风月谈·吃教》（《鲁迅全集》第五卷第245—246页）。

② 参看刘勰的《灭惑论》。

③ 俱见《灭惑论》。

则不止一次地提出了批评。所有这些，都可看出《文心雕龙》的产生及其指导思想，和当时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复杂斗争是有密切联系的。

与《文心雕龙》的产生直接有关的，当然是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状况。在文学领域中，南北朝统治阶级为了满足糜烂生活的欲求，也为了毒害人民群众，他们豢养了大批御用文人，结成庞大的文学集团，垄断文坛。他们于饮酒纵欲、寻欢作乐之余，吟诗作赋，滥充风雅，使文学变成供他们享乐的工具。例如齐武帝的二儿子竟陵王肖子良，不仅网罗了大批有名的和尚于门下，而且还把许多当时有名的文学家搜罗在身边，所谓“竟陵八友”^①，就是以肖子良为首的贵族文学集团。梁代的几个皇帝都喜好文学，梁武帝肖衍原来就是“竟陵八友”之一，当了皇帝后，直接控制文坛。他的儿子肖统（昭明太子）等，也都是当时贵族文学的创作者和倡导者。肖统组织了大批文士，除搞创作外，还搞文学作品选辑的工作，著名的《文选》就是他们编定的。《南史·文学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南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

所谓“儒雅”云者，实际是皇帝、贵族以及士大夫文人的宫廷文学、帮闲文学的代名词。由于文学成为供他们享乐的工具，毒害人民的腐蚀剂，结果，什么“永明体”、“宫体”、“齐梁体”之类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低级下流的色情文学，长期泛滥。关于这些情况，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这里只是要说明，

^① “竟陵八友”：指肖衍、王融、谢朓、任昉、沈约、陆倕、范云、肖朏等八人。